

论转轨经济中的内部人控制与道德风险

唐跃军

摘要: 本文主要集中对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下高道德风险进行深入的分析。文章首先分析指出转轨经济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缘于外部治理机制的软弱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失灵。在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了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模型。接下来文章分析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下高道德风险的形成机制, 得出转轨经济中道德风险模型。然后, 文章整合所有分析成果, 得出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模型。最后, 依据前述分析和模型, 以对管理的新理解和竞争理论为基础, 提出了避免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规避高道德风险的建议。

关键词: 内部人控制 道德风险 信息不对称 契约的不完备性 资本的扩大化

一、导言

在转轨经济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和由此产生的高道德风险引致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转轨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现实而且严峻的课题。本文基于对转轨经济国家企业公司治理中“内部人控制”的现实的思考, 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分析和探讨“内部人控制”现象和内部人控制中的高道德风险的原因, 并建立相关模型, 再提出一些避免严重“内部人控制”和规避高道德风险的建议。

本文将力图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 转轨经济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缘于外部治理机制的软弱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失灵。外部治理机制的软弱缘于转轨经济国家中糟糕的市场竞争环境, 而这又具体表现为缺乏竞争、有效的资本市场, 经理人市场尚在形成当中, 劳动力市场不完善, 同时存在大量的传统体制的遗留问题。内部治理机制失灵则是由于经理人员和企业职工基于共同利益形成联盟或互相“勾结”。

第二, 转轨经济中的高道德风险的原因包括信息不对称, 契约的不完备性和来自社会经济、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其他重要因素。在转轨经济中, 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加剧了信息不对称, 并使契约的不完备性被利用的可能大为增加。而且, 经济形态以及资本的演化中出现的“资本的扩大化”使信息不对称, 契约的不完备性的范围相应扩大, 同时, 信息不对称, 契约的不完备性的程度亦因此有所加深。

第三, 在前述分析及其所得模型的基础上, 依据对管理的新理解和竞争理论, 本文将提出一些避免严重“内部人控制”和规避高道德风险的建议。

总之, 本文旨在促进、加深人们对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的认识, 帮助转轨经济中的企业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找到有效避免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规避高道德风险的机制。

二、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

(一) 内部人控制现象

在许多转轨经济中, 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和钱颖一在其主编

的《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中给出的定义, 内部人控制是指经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 他们的利益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经理人员常常通过与工人共谋而这样做的。

青木昌彦(1994)认为, 内部人控制(由管理人员或由工人控制)看来是转轨经济过程中所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的现象, 是从计划经济制度的遗产中演化而来的。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中欧和东欧, 当计划经济制度的停滞加深时, 中央计划当局试图用撒手放权, 把大部分计划指标下放给国有企业的办法来应对面临的问题。企业经理借此在自己的企业内部构筑起不可逆的管理权威。中央计划当局的逐步退让以其突然解体告终。那些已经从计划机关获得很大控制权的经理们利用计划经济解体后形成的真空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在中国, 现实的差异在于党在选用和罢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保留着牢固的控制权, 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随着经济转轨的不断进行, 不仅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的趋势, 而且内部人控制已经成为一个现实而且严峻的问题。一种常见的加强内部人控制的方法是, 国有企业管理者创设附属单位, 而后将国有资产租给或者卖给这些附属单位, 这正是设立它们的目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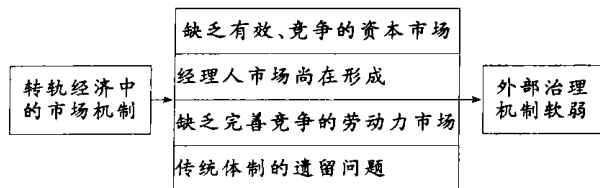
至于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企业的界定, 有学者认为可采用如下标准。一、企业经理和(或)工人这样的内部人掌握了企业管理资产使用的剩余控制权, 即法律和合同所规定的企业资产使用控制权(Grossman and Hart, 1986, 1990; Hart, 1995)。二、这样的内部人不仅掌握了企业资产使用的剩余控制权, 而且掌握了企业资产使用的剩余索取权(Milgrom and Robert, 1992)。

不管界定的标准如何, 现实的情况是, 内部人控制使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不同程度地遭到内部人的侵害, 企业的绩效不佳, 容易激起人们对分配问题的不满, 企业以及社会的效率性和经济性受到了损害。

(二) 外部治理机制的软弱

在正统的股东主权治理模式中, 对经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是由公司外部股东来完成的, 而外部股东作用的发挥程度依赖于一个有效率的, 具有评定公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功能的、竞争的资本市场, 同时还要通过其他一些制度安排,

比如竞争性的买卖经理人和工人劳动服务的经理人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以形成良好、完善的竞争市场环境系统。但在转轨经济中,上述竞争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不完善或缺少的,因此,来自公司外部的治理机制不能或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唐跃军:《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分析》,载《国际经济合作》,2002(2),42页(略有改动)。

图1 外部治理机制的软弱

接下来,我们将依照图1的框架,主要根据中国的情况,逐一进行分析。

1. 资本市场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已获得长足的进步。以证券市场为例,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值跃居亚洲前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是一个成熟、有效、竞争的证券市场。经济转轨和经济起飞导致资本极度稀缺,因此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一直强调证券市场是一个筹集资金的市场,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政府长期把股票市场当作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低成本融资的场所,是银行优惠低息贷款的一个替代选择,而不是为了要培育有效、竞争的证券市场。

从许多简单的事实中均可判断当前的证券市场是一个筹集资金的场所:其一,许多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企业,希望在内地增发股票,同时回购香港市场的股票,这是企业对于不同市场的市盈率的正常反应;其二,企业都希望上市筹集资金,即使是一个濒临破产的上市企业的壳也可以用来从市场上套取资金。

而另一方面,我们注意一下,华尔街在为谁运作?当代美国证券市场实际上对外部投资的融通的作用微乎其微。1901-1996年间,新发行股票总额仅占企业融资的4%;分开来看,1946-1979年,股票筹资与实际投资的比例仅5%,而到了1980-1997年,提供资金的比例变成了负数,为-11%。这并非偶然,多数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证券市场也都呈现出这一特征。新股发行占企业融资的比例,1970-1984年加拿大为2.5%,1970-1985年法国为-0.4%,1970-1989年德国为0.9%,1970-1987年日本为2.7%,1970-1989年英国为-8%。可见,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证券市场,并不是筹集资金的场所,而是证券市场基本职能的体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与投资者的投资市场。

在比较中可以发现,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尚属于一种筹资制度安排而非投资制度安排,因为要为国有企业筹资服务,我们实行了“审批制”这一全世界闻所未闻的市场准入管制,因为证券市场只是一种筹资制度安排而非投资制度安排,证券市场上伪造公文、虚假报表,上市公司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现象屡禁不止。糟糕的透明度、猖獗的市场操纵和证券欺诈严重玷污了刚刚起步的中国证券市场的信誉。不久前,销量甚广的《财经》杂志在其一期中报道了基金管理业的黑幕:2001年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中国目前的股市“比赌场还黑”。中国的股票市场平均市盈率达60,股票市值完全脱离了市场的基本面,散户的投机心理、盲目热情和经验不足,再加上期货指数的缺乏和操纵行为的泛滥,中国证券市场被大大地扭曲了,作为证券市

场基石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民事责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由于先天的制度缺陷,中国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目前根本不能被称为一个有效率的、具有评定公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功能的、竞争的资本市场,因而不存在公司外部股东对公司经理层发挥监督和控制作用的强大基石,这样使得依赖于有效、竞争的资本市场的股东外部治理机制软弱无能,不能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内部人控制提供了条件并最终使之成为现实。

2. 经理人市场

在过去的几百年,企业最稀缺的资源是货币资本,如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货币资本已不再稀缺,现在公司最感匮乏的是人力资本——才能、知识和创造力。这是业已上升为战略资本的稀缺资源。美国《商业周刊》2000年曾出过一本特辑:《21世纪的公司》。其核心观点是,21世纪的经济是创造力经济,创造力是财富和成长的唯一的源泉。人力资本是唯一的财产。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精英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其所创造的价值胜过许多一般劳动的总和。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知识精英的才能、知识和创造力实现优化配置并发挥其最大效用有赖于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中关键的一节则是竞争的经理人市场。正如众多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所意识到的,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为灵魂,由具备才能、知识和创造力的知识精英、经营管理人才组成的有效、竞争的经理人市场对经济改革、经济发展至为关键,但令人倍感急迫的是,中国以及和中国类似的转轨经济国家中的经理人市场基本上尚未建立。以中国为例,具体的情况是:

(1)中国固然缺少有才能的企业家,但更缺乏的是愿意并诚心为老板服务的,有道德的职业经理人。中国的企业不能长大?中国的民营企业能不能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水准。小企业变大,意味着委托代理链条逐步拉长。但如果我们的经理人是不可信赖的,总是极可能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有哪一个老板肯把企业交给他管理呢?

(2)中国缺乏愿意并诚心为老板服务的,有道德的合格职业经理人,但应当看到的一点是,合格的老板更少。合格的老板少,很可能是合格的专业经理人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3)要建立经理人市场,则职业经理人的流动不可避免,这是正常现象。但在转轨经济国家中,从一个不变的体制到一个流动的体制,需要时间适应。同时中国还有传统价值观:把企业、公司看成家庭,看成忠诚的对象,以至于经理人的正常流动被视作“叛变”,体现出转轨经济之中特有的心理现象。

(4)法律及其他规则匮乏。和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同样匮乏的是与经理人市场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经理人市场的空白或无效,现有企业的把持者缺乏来自市场的竞争。这使得激励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又没有来自外部,特别是市场的有效监督,内部人控制只会日趋严重,导致所有者利益受到侵蚀,企业经营效率徘徊在低水平上,难有起色。

3. 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类型的市场共同实现经济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但就中国而言,由“二元经济结构”引致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很不完善,与统一、平等、开放、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1) 中国劳动力市场仍具有城乡分割, 地域分割的基本特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多种因素限制;

(2) 企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也存在诸多限制, 损害了公平与竞争原则;

(3) 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还造成了管理上的许多漏洞, 相关的法律规范尚待进一步完善落实;

(4) 和劳动力市场配套的社会保障体制尚在建立和完善中。

以上这些, 极大地损害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竞争性和有效性, 无法提供保证劳动力价值实现的竞争渠道。因此在传统体制下已对就业企业形成过分依赖的企业职工只能倾向于内部人控制, 维护其作为劳动者的利益, 甚至在谋求私利的驱动下侵蚀原本属于所有者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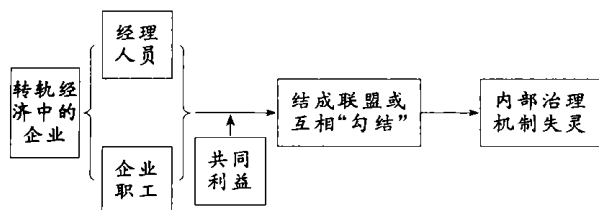
4. 传统体制的遗留问题

在转轨经济中, 将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传统体制的遗留问题。一方面,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 行政命令泛滥等计划经济的遗留还广泛的存在。如在证券市场上搞行政操作, 实行“拉郎配”, 以行政命令强行组合搭配等错误做法, 不按市场规律办事, 损害了市场机制的公平、竞争和效率。另一方面, 传统体制推行了几十年, 对社会及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模式和心理习惯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完全从旧体制中走出来, 适应并积极倡导新体制需要假以时日。

应当指出, 传统体制的遗留是极为广泛的, 在某些领域可能还很牢固, 是我们可切实感受到的, 此处不再作过多的阐述。而传统体制的遗留问题不仅是外部治理机制软弱的重要原因, 也是内外部治理机制趋向于失灵的重要原因。

(三) 内部治理机制失灵

现在我们将转移到对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探讨。在转轨经济出现严重的内部人控制, 内部治理机制失灵可以说是更直接的原因。而内部治理机制之所以失灵, 主要是因为转轨经济中的内部人控制, 企业中经理人员和企业职工很容易在共同的利益之上结成较为稳固的联盟或互相“勾结”(如图2所示)。



资料来源: 唐跃军:《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分析》, 载《国际经济合作》, 2002 (2), 44 页(略有改动)。

图2 内部治理机制失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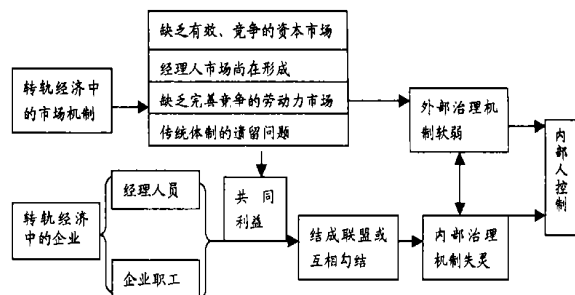
由于经理人市场尚在形成之中, 又缺乏完善、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转轨经济中企业的内部人, 包括经理人员和企业职工, 对他们就业的企业有着很强的依赖。企业效益好时, 经理人员和企业职工理所当然地增加收入。企业亏损时, 也要尽力保证内部人的生活待遇不降低。内部人受益的途径包括: 工资奖金增加、享受公有住房和医疗保险、子女安排就业、折价购买企业股票以及各种在职消费等。这些受益大部分靠占有本应属于所有者的收益而实现¹⁰。

共同的利益追求使经理人员与企业职工很容易结成联盟或相互“勾结”, 而不像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因为企业经理人员代表所有者利益而与职工存在利益冲突。又由于绝大部分经理人员是从企业内部提拔上来的, 而非出自经理人市场上的竞争, 所以经理人员与企业职工的这种联盟或互相

“勾结”可以很好地维持下来, 利用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息优势, 再加上契约的不完备性使企业契约存在“漏洞”, 从而导致内部治理机制失灵, 形成严重的内部人控制。

(四) 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模型

在经过上述分析之后, 我们可引出如下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模型(见图3):



资料来源: 唐跃军:《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分析》, 载《国际经济合作》, 2002 (2), 44 页(略有改动)。

图3 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模型

显然, 我们在此提出的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模型综合了前面的分析成果, 同时有必要指出, 正如图3所示, 外部治理机制的软弱和内部治理机制失灵之间是紧密相联的。外部治理机制的“软弱无能”, 客观上提供了内部治理机制失灵的条件, 否则, 在有效、强大的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下, 内部人处于外部人严密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中, 则内部治理机制不至于失灵。同样, 正是由于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处在失灵的状态中, 而外因又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对事物的发展起作用, 这必然使外部治理机制难以有所作为。两者彼此影响, 且具有相互加强的趋势, 极易在转轨经济条件下导致恶性循环, 不断加重内部人控制现象。

此外, 在前述分析中已指出, 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企业里的经理人员和职工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市场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实际上, 传统体制的遗留问题、经理人市场的空白、缺乏完善、竞争的劳动力市场都是导致并强化共同利益的重要因素。

三、转轨经济中道德风险

关于道德风险, 科托威茨(Y. Kotwitz)给出的经典定义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行动的可能性¹¹。这种可能性由信息不对称, 契约的不完备性和来自社会经济、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其他重要因素造成。而且, 有必要指出, 经济形态以及资本的演化中出现的“资本的扩大化”使信息不对称, 契约的不完备性的范围相应扩大, 同时, 信息不对称, 契约的不完备性的作用程度亦因此有所加深。

在转轨经济中, 上述引致道德风险的因素无疑更加强化了, 在内部人控制中往往形成高道德风险, 而高道德风险则触发了各种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一) 资本的扩大化

在完全进入正题前, 先来简要讨论一下资本的扩大化将是必要的, 因为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 资本的扩大化扩大了形成道德风险的两个主要因素的范围并加深了起作用的程度。

众所周知, 在传统经济学中, 环境一直以来都是经济的外生变量, 只是作为“自然要素”存在, 与经济并无多大关系。所有的环境问题, 只是作为经济增长的外在性来研究, 并没

有将环境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 没有把环境作为资本看待。而实际上, 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 21 世纪将是人类步入生态文明的开始, 经济形态将演进到生态经济之一新模式。环境, 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 已经或正在上升为资本, 从企业角度看, 其所拥有的或依赖的资本在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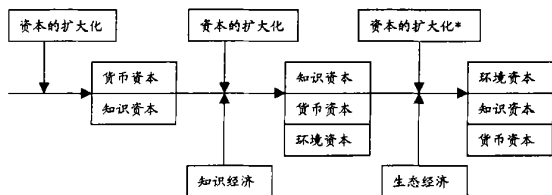


图 4 资本的多元化发展

需要解释的是标注了 * 号的资本扩大化实指资本, 主要是环境资本内涵的扩张以及其地位的不断上升。

诚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指出的, 我们目前仍处于知识经济时代, 但环境资本已经浮出水面, 并将逐步演化为未来新经济形态下的战略资本(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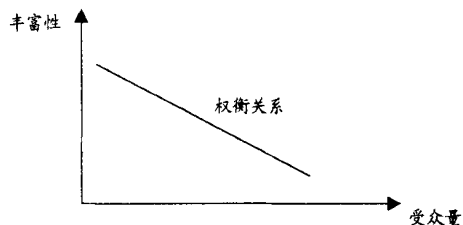
表 1 经济形态及战略资本的演进

经济形态	原始经济	农业经济	工业经济	知识经济	生态经济
战略资本演进	环境资本(自然环境资源)	环境资本(土地)	货币资本	知识资本	环境资本 知识资本
寻求战略优势	迁徙、部落战争	通过战争获取土地	通过世界殖民主义体系获取货币财富	人才培养和争夺研究开发(R&D)	自然环境 保护、社会环境 营造、人才培养 和争夺、研究 开发(R&D)

从表 1 经济形态及战略资本的演进看来, 事物的发展似乎总是回归到“原点”, 但有必要指出, 演进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运动, 三个环境资本具有不同的经济含义。原始经济形态下的环境资本主要指可资利用的自然环境资源; 农业经济时代的环境资本主要指土地。而生态经济中的环境资本, 包括自然环境资本和社会环境资本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亦将其称为“第三种资本”。从企业角度, 可将环境资本定义为企业拥有的除货币、知识资本之外但又和两者紧密相连的资本。由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中除股东、员工之外的机构、组织、个人或其他构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要素提供, 以诸如使企业缴纳税收、履行社会责任等方式获得资本回报。

(二)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为内部人控制创造了条件, 同时, 信息不对称更是形成道德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信息丰富性与受众量之间存在一种总体上的权衡¹², 如图所示:



资料来源: [美] 菲利普·艾文斯、托马斯·沃斯特:《裂变: 新经济浪潮冲击下的企业战略》, 中文版,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略有改动)。

图 5 信息丰富性与受众量之间的权衡

信息丰富性与受众量之间的权衡关系导致了信息不对称, 对企业而言, 内部人和外部人, 即代理人和委托人在“权衡关系”中的处境是有明显差异的, 代理人属于少数, 却享有丰富的信息, 而大量的外部人则由于传输渠道等原因接触不到足够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可具体为: 一方面, 代理人的某些行为是隐蔽的, 很难被委托人所觉察到并加以提防, 在委托—代理契约中难以对未来事项面面俱到。代理人可能拥有独家信息, 阿罗(Arrow)把这类信息优势划分为“隐蔽行动”和“隐蔽信息”。前者包括不能为他人准确观察到和预测到的行动, 因此, 对这类行动订立契约是不可能的; 后者包括代理人对事态的性质有不够全面的信息, 但这些信息足以使其采取恰当的行动, 委托人则不能完全观察到。另一方面, 委托人掌握某些信息只根据自己占有为限¹³。

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有关当事人之间的风险分担会引致道德风险问题。在信息为私人所掌握的情况下, 即使所有当事人对风险持中立立场, 道德风险也不可避免。

特别地, 资本的扩大化扩大并深化了委托代理的内容, 由货币资本为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转变为以货币资本、知识资本以及环境资本为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相应地, 存在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 具体表现为范围的扩大和内容的深化。在转轨经济中, 在内部人控制的条件下, 信息不对称加剧的趋势更为明显, 内部人控制使内部人拥有和外部人相比更为显著的信息优势。如此一来, 高道德风险的生成是在情理当中的。另外, 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实际上存在互相强化的关系, 也就是说, 内部人控制加剧了信息不对称, 而反过来, 信息不对称又促成了内部人控制。

(三) 契约的不完备性

由科斯开创的企业理论被称为“企业的契约理论”(Coase, 1937), 经济学家张维迎(1996)曾将这一理论的要义概括为如下三点: (1) 企业的契约性; (2) 契约的不完备性(或不完全性); (3) 以及由此导致的所有权的重要性¹⁴。在此, 我们主要关注契约的不完备性。

一个完备的契约指的是契约准确地描述了与交易有关的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 以及每种状态下契约各方的权利和责任。反之, 如果一个契约不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不完备的契约。换句话说, 不完备的契约就是一个留有“漏洞”的契约。由于有“漏洞”, 不完备契约常常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执行性。契约的不完备性的存在可以用不确定性及由此导致的交易成本来解释。正如哈特所归纳的, 缔约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可忽视的交易成本¹⁵: (1) 在一个复杂的, 不可完全预测的世界中, 人们很难想得太远并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到, 也很难对它们做出应对计划; (2) 即使能够做到(1), 缔约各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 因为他们很难找到共同的言辞来描述各种各样的情况和行为, 先前的经验也无多大用; (3) 即使能够做到(1)和(2)这两点, 他们也很难在出现纠纷时, 使外部权威(如法院)明确理解并强制执行合同。所以人们缔结的基本上是不完全契约, 契约是有“漏洞”的, 不可能预料到所有的情况, 也不可能规定各种可能情况下各方的责任和权利。于是, 道德风险也就必然存在了。而实际上, 这也是内部人控制不可避免的原因之一。

此外, 如前所述, 资本的扩大化扩大并深化了委托代理的内容, 而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是靠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契约来维系的。因此, 契约的范围相应扩大, 内容也深化了。这必然扩大契约的不完备性的范围并加深其作用程度。同时在

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条件下,造成不完备契约的三种交易成本更大,更可能发生,因此,这对契约的不完备性的范围的扩大和作用程度的加深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所有这些,构成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下的高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同时,类似于上一节中提到的,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同样存在于内部人控制和契约的不完备性之间,其中的作用逻辑应当是明显的。

(四) 其他重要因素

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性是引致道德风险的主要原因。但应当注意到,还有来自社会经济、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其他重要因素在对道德风险起作用。

从经济角度看,正是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引致了相对更高的道德风险。一方面,转轨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尚在建立和完善中,其中存在大量的传统体制的遗留问题,缺乏有效、竞争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尚在形成中,缺乏完善竞争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内部人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并缺少来自外部市场的监控。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从传统体制下走到转轨经济中的经理人员和企业职工由于双方间的共同利益而易于结成并维持联盟,形成内部人控制,这些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并使契约的不完备性被利用的可能大为增加,从而引发高道德风险。

在法律方面,经济转轨时期相应的法律规范是极为匮乏的(尽管这一情况正在被努力改善,如中国),而且大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对个人或组织缺乏严格有效的法律约束,如此,形成高道德风险,并不奇怪。

另外,从社会心理看来,在转轨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传统的道德习惯、行为准则不再被尊崇,而新的道德习惯、行为准则又未形成或未被恰当接受,从而造成社会心理的混乱,并由于一些人不好的示范作用,造成社会心理及其中个体和组织不良的心理取向,使高道德风险难以规避。

(五) 转轨经济中道德风险模型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具有转轨经济特征的道德风险模型(如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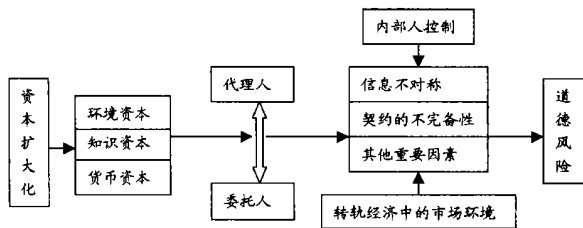


图6 转轨经济中道德风险模型

应当说明,上述转轨经济中道德风险模型还综合了文章第二部分中相关的分析成果,诚如在前面分析中提到的,在转轨经济的市场环境中,内部人控制条件下,信息不对称加剧了,契约的不完备性被利用的可能大大增加,而且正是由于在转轨经济中,我们还需给来自社会经济、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其他重要因素以足够的关注。这些共同引发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下高道德风险。

四、结论

(一) 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模型

在以上的两部分中,我们分别分析了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下高道德风险的原因。分析虽然在形式上是分开进行的,但两者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这在分析中已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有些原因是共同的,相互作用的。

基于这一事实,我们综合第二、三两部分的分析和模型得出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模型(如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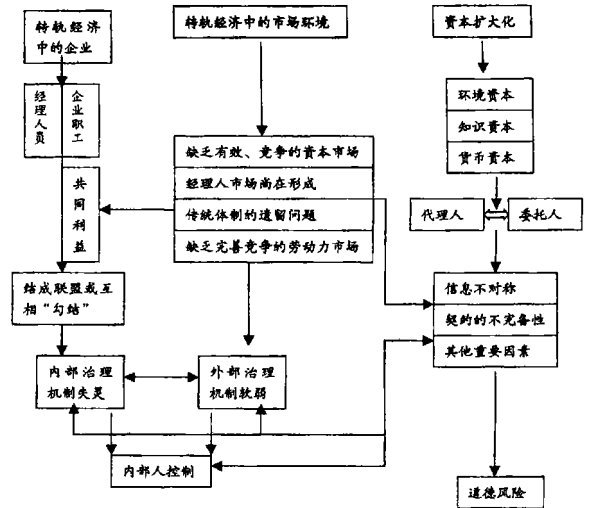


图7 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模型

以上即我们在分析中所依据的逻辑和总的框架,也是我们对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下高道德风险的分析得出的综合性结论。具体的分析请参见前文,此处不再重复。

(二) 避免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规避高道德风险

现在,我们对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下高道德风险的形成机制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和深入的认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依据前面的分析和模型,寻找避免严重“内部人控制”和规避高道德风险的途径。对此,我们的建议是:目前处在转轨经济中的国家的政府,首要的任务是正确理解现代管理的含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提供环境资本的服务者,全力创造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正如在各类文献中提到的,关于管理的各种真知灼见,可谓不一而足,而我们比较推崇的是由哈罗德·孔茨对管理定义:“管理就是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¹⁶ 这指出了管理的真正含义,其一,一切管理工作应专注于“设计并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其二,管理指向的是高效率,而非其他。因此,更进一步地,我们愿意在哈罗德·孔茨的基础之上,结合我们在资本扩大化中提到的对经济的一些新认识,将管理理解为“管理是环境服务,是指向高效率的环境服务。”在这里,基于环境资本的重要,我们提出“环境服务”的新概念,以便可以简洁、有效地追踪到管理的实质。政府的环境服务即指向为其所服务的企业、组织、个人提供可资利用的环境资本。在这里,提供环境资本更具体更集中地体现为全力创造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际上,具有良好洞察力的学者们业已指出,转轨经济国家经济改革的核心即在于为经济发展中的各类经济主体(尤其是至为关键的企业)创造一个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¹⁷。不仅如此,我们的建议还得到了竞争理论的坚强支撑。

超产权理论认为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增加努力和投入的作用。在实际中,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发现在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之后效益改善不明显,缺乏竞争是根本原因。显然,超产权理论把竞争看成激励的一个基本因素,其逻辑依据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竞争理论,其具体内容有四部分:竞争激励论,

竞争发展论, 竞争激发展论与竞争信息完善论¹⁸。

可以发现, 超产权理论和竞争理论强调的一个基本政策含义即创造一个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市场竞争的充分性体现在市场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的有效性和完善性上。而就现在的情况看来, 尽快建立一个高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在改革中要更紧迫些。

除去来自管理理论、竞争理论方面的有力支持, 我们的建议主要直接依赖于我们对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下高道德风险的分析和经分析得到的相关模型。正如在分析中着重指出并为模型所清晰体现出来的, 转轨经济中的市场环境的诸多缺陷和弊端不仅直接引致外部治理机制的软弱, 使之不能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而且经由其促成并维持的共同利益, 间接导致内部治理机制失灵(分析中还表明, 直接作用也是存在的)。而以上这些共同造成了转轨经济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同时, 另一方面, 转轨经济中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市场竞争环境, 不仅是导致内部人控制的主要原因, 而且在客观上加剧了信息不对称, 增大了契约的不完备性被利用的可能性, 并给来自社会经济、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其他重要因素以方便。从而共同引发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下高道德风险。并且, 应当指出, 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之间的相互强化也是以市场竞争环境为介质和作用工具的。

此外, 我们所建立的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模型清晰、形象地表明, 市场竞争环境处在核心地位, 而这绝不是出于作图的需要, 它和模型中的其他部分联系甚紧(如图7所示)。

综合以上阐述, 我们的建议不仅在理论上, 而且是在实践分析中, 都是恰当的, 是值得考虑的。同时, 我们的建议如下:

1. 转变政府管理当局的理念, 抛弃传统的思维和习惯, 明确“管理是环境服务, 是指向高效率的环境服务”, 在意识到环境资本的重要性的基础上, 纠正先前的错误或存在严重偏差的角色取向, 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在经济改革中向企业提供环境资本的服务者。
 2. 理顺资本市场的发展思路, 实现证券市场由筹资型向投资型转变, 培育一个有效率的, 具有评定公司价值和转移公司控制权功能的、竞争的资本市场。
 3. 重视经理人市场的建立和健全, 改造传统观念, 发展相应的法律规范, 培育高道德水准并在法律有效约束之下的职业经理人, 形成竞争的经理人市场。
 4. 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和限制,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高效、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 堵塞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漏洞。
 5. 花大力并准备长期努力以消除传统体制各种有害的遗留问题, 建立新体制下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6. 在一个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不断创造过程中, 硬化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 使其经营绩效唯一地接受市场竞争的评判, 促使其为了竞争需要而改变和创新企业经营机制, 并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筛选和发展形成一种在市场竞争中和在国际竞争中立得住脚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相应的有效的治理模式¹⁹, 以避免当前企业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并规避内部人控制下的高道德风险。
- 我们可以断言, 没有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不可能得到遏制, 其中的高道德风险亦在所

难免。

注释:

1. 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36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 [日]青木昌彦:《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的若干问题》,载《改革》,1994(6)。
3. 费方域:《控制内部人控制》,载《经济研究》,1996(6)。
4. 10 11 李维安等:《公司治理》,6、7、83、84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5. 武志:《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7)、(8),60页。
6. 胡祖六:《资本市场正在改变中国》,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9)、(10),18页。
7. 秦朔:《珍惜会跑的资本》,载《南风窗》,2001(1)。
8. 沈晓梅:《试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载《中国劳动》,2001(9),9~11页。
9. 12 [美]菲力普·艾文斯、托马斯·沃斯特:《裂变:新经济浪潮冲击下的企业战略》,30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10. 14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载《经济研究》,1996(9),3页。
11. 16 Harold Koontz, and Heinz Wehrich, “Manage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tenth edition, McGraw - Hill, Inc, 1993, pp.4.
12. 17 19 林毅夫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环境》,载《改革》,1995(3),23、23页。
13. 18 梁能主编:《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和美国的经验》,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 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 [日]青木昌彦:《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的若干问题》,载《改革》,1994(6)。
3. 费方域:《控制内部人控制》,载《经济研究》,1996(6)。
4. 李维安等著:《公司治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5. 梁能主编:《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和美国的经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6. 林毅夫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环境》,载《改革》,1995(3)。
7. 沈晓梅:《试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载《中国劳动》,2001(9)。
8. 武志:《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7)、(8)。
9. 唐跃军:《转轨经济中内部人控制分析》,载《国际经济合作》,2002(2)。
10. 肖梦:《寻求对企业的外部监控机制》,载《改革》,1995(3)。
11.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载《经济研究》,1996(9)。
12.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3. Ronald,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s, IV: 368-405.
14. Colin Mayer, “Corporate Governance Market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Shanghai, October 1995.
15. Grossman, S And Hart, O.,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pp.691 ~ 719.
16. Harold Koontz, and Heinz Wehrich, “Manage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tenth edition, McGraw - Hill, Inc, 1993, pp. 4.
17. Lar Werin and Hans Wijkander, “Contract Economics”,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18. Li Wei'an, “How to Better Manage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ransition, Vol.10, No.4, The World Bank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William David Institute, August 1999.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研究生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Q)